

香港高教的落差 [2015年2月9日信報](#)

我們旁邊有很多人科研卓越，譬如有 8 位華人先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物理獎，這說明華人的智力與素質很好。但是他們幾乎全都是因為在西方受教育與西方的研究成果而得獎，這又表示我們的大學尚未發揮最大的功效。如果大學教育夠現代化，則必然會培養更多的人才。

教學與研究

教學與研究似乎是香港的大學校園中兩個平行和分割的行業；不僅一般民眾，即使高教界人士，也往往認為研究是研究所、研究員的職責，與教課的大學老師無關。有人還認為，或許「研究」不是中華文化固有的元素，大學教師可以不做研究。

大學研究的傳統始於 19 世紀初的德國。19 世紀英國教育家 John Henry Newman 在他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一書中曾經認為，透過傳授知識培養理智是大學的唯一任務，根本沒有做研究的空間。在他看來，從事教學沒時間做研究，而做研究則很難分心從事教學。香港高教界一度以重教學為藉口而有「反研究」的傾向，好像回到 19 世紀的英國，令人哭笑不得。

把大學分為教學、研究兩型，與先進的實情不符。當今美國高教界，凡開設博士學位課程的大學，已難見教學型與研究型之分。不妨以許多人視為「教學型」標誌的加州州立大學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為例，表面看來，絕大部分甚至不設研究院，似乎屬於教學型，但校內教授仍然認真從事研究，只是研究佔其工作總量的比重較低；教師要晉級升等，也須呈交研究成果。

教學與研究的方向

香港教資會的文件曾經明文標示，某些大學從事「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甚至用過時的天馬行空 (blue sky) 的論說來陳述「非應用研究」。

此說有趣。近 20 年來諾貝爾物理、化學獎多次頒給工程應用方面的研究，表示問題導向的研究位居主流，一切研究都要有個原因、帶些目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就常要求申請者列舉研究問題的功能應用性，也就是問題背後所代表的物理意義 (physical meaning)。當今哪有多少專業居然不以問題導向，應用為主；研究就是研究，不要亂提空泛的概念。假若真有所謂的「應用研究」，也非任何大學的特有標徵。事實上，大學的宗旨是教研並重、教研相長，而且研究的領域也不僅限於科技，還包括商管、人文、法律、社會、媒體設計等。

缺乏研究的學科，沒有深度，進不了大學的門。

教學未必先進，研究先受忽視

把大學分為教學型與研究型，就好像把維持健康的方式分為飲食健康型與運動健康型，不實際也不正確。僅此分類思維，就表示我們在「心件」上落後，想必有些更與教研的認知有關。有些說法表面上重視教學，但事實上研究不成，教學也不傑出。再者，如果說哪些大學真是以教學見長，那怎麼難見國際上通用的大學教科書為以教學見長的教師所撰寫的呢？

事實上，一所大學，若不重視研究、缺乏研究成果，其教學就沒有根底，寫不出好的教科書，當然學術水準就難以提升。因此，香港的高教界—或由此可推知中國大陸的大學—若要趕上世界先進水準，須得端正心態，去除某些誤解或過時的觀念，先從了解和重視教研的相互關係、致力「教研合一」來調整我們的「心件」。何況教學的內涵還包括了複雜的教學研究。

副學士

九七之後，香港製造出許多定位不清、有通識、缺專才的副學士，大學也增收了不少副學士學位的畢業生。當初設立副學士學位，師法美國的社區學院制度，其出發點是好的。可是美國並非像香港一樣那麼唯「學位」為是。香港人取得了副學士，一心只想最終得到學士學位，這也許是當初始料不及的。

香港學士學位有限，每所大學的空間擁擠。如此，一方面因為大學名額有限，副學士畢業生有可能無大學可進，又身無一技之長，以至閒置社會；另一方面如果勉強由大學大量招收副學士畢業生，有可能導致學位泛濫，高學位高失業率的社會問題將早晚顯現。

學士學位未必是最佳選擇。如今審視「80後」、「90後」大學發展的實踐歷程，可在強調教研並重的原則下，堅守優質教育的宗旨，人盡其材，慎重思考辦理高水平的專職教育，提供紮實的工、商、文化、旅遊服務等專科技能訓練機會，以取代在職場競爭力不高，又進不了四年制大學的副學士學程。